

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中 “异乡人”的叙事与空间流动

李紫敏*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

摘要

本文以丁云《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为研究对象,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探讨作品中异乡经验的形塑方式。通过对小说中不同空间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丁云并非单纯书写离散与乡愁,而是通过多层次的空间建构呈现一种持续失衡的生存经验:在地志空间层面,狭窄拥挤的居所与被排斥的城市空间,使异乡人难以获得安身之地;在时空体层面,新柔长堤作为跨境流动空间,既象征通达的可能,也不不断强化现实中的边界与限制,使人物被困于无法完成的迁移之中;在文本层面,碎片化结构与多重视角叙事进一步瓦解了稳定的空间感知,使异乡呈现为一种破碎而不稳定的世界经验。《迷途的黑鲸》所书写的异乡,并不是一个可以抵达并安顿主体的空间,而是一种在居所压缩、跨境流动与破碎感知之中形成的存在状态。在马华文学的离散叙事传统之外,丁云的异乡叙事呈现出当代跨境社会中更具流动性与不稳定性的主体经验。

关键词: 丁云,《迷途的黑鲸》,空间叙事,跨境流动,马华文学

* 李紫敏,一级助理导师,现就职于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研究方向为华文文学、科幻文学。

Narratives of the “Stranger” and Spatial Mobility in Ding Yun’s Short Story Anthology *The Lost Black Whale*

Li Zimin

Beijing Normal–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reative trajec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s deeply interwoven with the experience of diaspora. From the “homeland dreams” of early migrant writers to the post-war localization of “native place” or topophilic writing, a dominant mode has emerged in which nostalgia constructs “place attachment” as a means of stabilising identity. However, Ding Yun’s literary production represents a different trajectory: writing from a position of prolonged residence in Singapore after migrating from Malaysia, she persistently articulates the condition of the “stranger” within a state of continual displace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ing Yun’s fiction, through its distinctive spatial narratives, provides a crucial textual sit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uspension and negotiation of diasporic identity under conditions of ongoing mobility. Drawing on Yuri Lotman’s model of narrative space as a foundational analytical tool,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topos, chronotope, and textual space in her fiction, while also incorporating Gaston Bachelard’s poetics of phenomenology to capture emotional memory and psychological imagery embedded in mobile experience. Through this framework, the study seeks to elucidate how, in *The Lost Black Whale*, Ding Yun transforms physical spatial mobility into a metaphor of spiritual wandering, thereby representing the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y’s dilemmas of belonging, identity resilience,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Keywords: Ding Yu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patial narrative; identity resilience

一、前言

在《迷途的黑鲸》中, 一群来自泰国的劳工挤居在破败的宿舍里: 走廊堆满沾泥的鞋子和建筑工具, 晒衣架上悬挂着似乎永远洗不净的工作服, 夜半骤然响起的凄厉哀号, 更使原本应是休憩之所的“居所”转化为令人窒息的不安空间。这样的场景并非孤例。丁云“异乡梦”系列中的女工、女佣、移民与跨境家庭, 大多都处在空间被压缩、生活被悬置的状态之中: 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异乡, 却并未真正抵达可以安顿身心的地方。

由此可见, 丁云小说中值得追问的, 并不只是离散者“身在何处”, 更是异乡空间如何具体形塑了他们的生存经验、心理状态与身份困境。相较于以往较多从离散、怀旧或认同问题切入马华文学研究, 丁云的《迷途的黑鲸》小说集更提示我们: 异乡人的漂流经验, 往往并不是通过抽象观念来呈现, 而是通过宿舍、长堤、工地、城市边缘、返乡道路等具体空间, 被一步步组织出来的。

事实上, 马(新)华文学自诞生以来便与“离境”(张锦忠, 2003)经验密切相关¹。从早期南来作家的“他乡书写”, 到战后逐渐形成的本土叙述, “家乡/异乡”的转换始终是重要母题。无论是林春美、杜忠全笔下的槟城, 陈政欣书写的武吉, 还是曾漂泊异乡终又回归故土的商晚筠、王润华, 其创作皆可视为通过回忆与怀旧建立“地方连接”(Lewicka, 2013), 以此维系个体与生命本原的情感联系², 但在“回归”与“连结”的叙事脉络之外, 仍存在另一种更具流动性与断裂感的书写路径: 个体在多重空间之间持续迁移, 却始终无法真正安居。丁云正是这一脉络中值得重视的作家。他从马来西亚南下新加坡, 其创作既延续了马华文学的离散主题, 也通过频繁转换的空间场景, 呈现出现代异乡人“无处为家”的生存处境。

基于此, 本文拟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考察《迷途的黑鲸》小说集, 重点分析作品中具体场景所构成的空间结构、人物在跨境流动中形成的边界经验, 以及叙述方式对异乡感知的重构。方法上, 本文主要借助加里布尔·左伦(Gabriel Zoran, 1984)的叙事空间理论, 将空间视为推动人物经验与叙事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 并适度参照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957/2013)关于空间与情感记忆的论述, 以更细致地把握丁云小说中漂流经验的空间表达。

¹ 张锦忠指出, “离境”为马华文学的重要象征, 其间交织着诡谲与辛酸, 它既是被边缘化者不得不离心的选择, 也悬置着离境之后依然存在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属性问题。参见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 台北:麦田, 2003年, 第43页。

² Lewicka指出, 当人经历迁移、失落或环境变动时, 往往会通过记忆中的地方经验获得情感补偿, 实现“地方连接”(place attachment), 并借由保存逝去的时光重建生命的连续感。参见Lewicka, M. 收录于Manzo, L. C., & Devine-Wright, P. (Eds.), *Place attachment: Advances in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Routledge, 2013, p. 53.

二、失衡的地志空间：从居所崩塌到原乡断裂

《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中的异乡经验，首先并不是通过抽象的身份议题展开，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压迫的生活场景被感知出来。在这些场景中，最先出现并最具冲击力的，正是异乡人的“居所”。在通常意义上，居所本应是人从外部世界退回、恢复体力与确认自我的地方，但在丁云笔下，它却往往率先崩塌，成为焦虑、恐惧与失序的来源。《迷途的黑鲸》中泰国劳工宿舍的描写，正典型地揭示了这一点：

两根柱子，仍然挂着那破漏的球网，在风中摇晃抖擞……沾满泥巴的鞋子和建筑工具七凌八乱的堆塞在走廊上。晒衣架上吊挂着似永远洗不干净的工作服，而洋槐树的落叶、枯枝铺满院子。……七八个脸色灰暗，忧沉的泰工正垂头丧气，或蹲或坐，在走廊前抽着朱律烟！

我正踌躇又踌躇间，房里突然响起一阵凄厉地哀叫声……那叫声……似乎流露绝望、戮心的嚎哭，像要断气的最后一声嗥喊！

从泰工们忧虑的神色中，我马上联想到“夜发猝死综合症”！最近喧喧腾腾的不是有这样的报导吗？单单九一年间，就有 45 名来自泰北的劳工在半夜睡梦中突然并发心脏衰竭，痛苦挣扎数分钟后即暴毙而去……。

但显得比暴毙更凄惨的，嚎哭声已变成伤心的饮泣，流泪满面，蜷缩在床角。（丁云，2004，页 8-10）

宿舍外部先已显出败坏，球网破漏、工具乱堆、衣物肮脏、落叶满地，整个空间失去活力；而当叙述者进入室内，所遭遇的不是休息的平静，而是凄厉哀号、猝死传闻、阴暗潮湿与“蜷缩在床角”的身体图景。换言之，这里并不是让人恢复精神的内部空间，而是一个不断逼近肉体极限与心理崩溃的场所。在左伦（1984）看来，这种“里/外”的空间并非单纯背景，而是已经构成了人物生存经验的基本结构：外面的工地耗损身体，里面的宿舍也无法真正疗愈身体，所谓“内部空间”于是失去安顿功能，沦为另一种耗损。丁云对泰工宿舍的描述再现了外劳生活的艰辛，同时颠覆了巴什拉（2013）对“家宅”作为庇护空间的通常意义。

这种内部空间的崩塌，并不只出现在泰工宿舍，而是构成整部小说集异乡人居住状态的普遍面貌。宋迪猜只有一个床位；苏菲娅虽“住”在雇主家，却并不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与时间；慧敏为了分担八十元房租，只能把原本已经狭小的空间再切割，分租出去；卓燕与两位大马女工同住，连摆一张书台也做不到。也就是说，异乡人并非完全无家可归，而是被迫停留在一种“有落脚处却无安身处”的状态里。他们拥有的只是床位、角落、临时分租的小房间，空间不属于自

己, 生活也始终处于被压缩之中。巴什拉(2013)强调家屋常常是记忆、温暖与主体感的凝结点, 但在丁云笔下, 角落、床位、走廊这些本应退守自我的地方, 却反而不断暴露出自我的脆弱与无依。于是, “家宅”不再是肯定性的内部, 而成为异乡人被剥夺、被挤压的最直接见证。

如果说居所的崩塌揭示了异乡人在内部空间中的失衡, 那么城市空间则进一步显示出他们的外部世界中的被排斥。小说集中, 异乡人并非不能进入城市, 相反, 他们在城市中不停劳动、通行、穿梭, 但这种“进入”并不等于真正拥有城市。《遥远的打扪湾》写到的“Yellow Box”便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 它既是城市交通规训的标志, 也象征异乡人在都市中必须时时识别并服从的边界。人物可以走过大士湾防浪堤、新柔长堤、滨海湾码头、珊顿道商业大厦、市政局、鱼尾狮、维多利亚剧场和高等法院前的大草场, 却始终“进不去中心”, 只能在外围游移。表面看来, 他们已经置身现代都市景观之中, 实际上却始终被置于城市秩序的边缘。

异乡人的生活呈现出鲜明的内外双重困境。对内, 宿舍、公寓、雇主之家都无法构成安全空间; 对外, 城市虽然繁华、开放, 却并不真正接纳他们。这样的空间安排使人物始终处于中心缺失的状态, 也使失眠、神经痛、焦虑与绝望不断出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宋迪猜、苏青瑶、阿扬等人的精神失衡, 正与这种“无处属于自己”的空间处境密切相关。换言之, 异乡人的问题并不只是经济贫穷或工作辛苦, 而是他们在空间结构上被同时挤出内部与中心, 既没有真正的“里面”, 也无法进入真正的“中间”。

然而丁云的描写并非仅停留在异乡城市的内部/外部对立, 在这些人物身后, 还始终存在着另一个被不断想象、召唤与回望的空间, 那就是家乡。小说中, 家乡与城市构成另一组鲜明的对立: 对于仍留在乡村或小镇的人而言, 异乡往往意味着机会、阳光与出路。《遥远的打扪湾》中, 慧敏的同乡人来信写道:

我啊, 愈来愈受不了这里的空气、环境、一切的一切……你看到新闻吗? 他们说外国把工业废料埋到我们那儿, 改天我们都会喝辐射水中毒了! 敏, 我整天呆在相馆冲洗照片, 不然就是做复印……我要疯掉了! 新加坡应该有更灿烂的阳光, 更多姿多彩的生活吧? 我真想出来闯一闯。
(2004, 页 49-50)

慧敏同乡人眼中的家乡意味着闭塞、污染、压抑与无望, 异乡则被想象为更明亮、更开放、更有前途的地方。正因如此, 许多人物背负着家庭负担、经济压力与向上流动的期待进入城市。青瑶身后有烂赌的母亲与待养的弟妹, 宋迪猜需要供养母亲与妻儿, 苏菲娅有丈夫与两个孩子, 慧敏则通过多份工作来积攒学费:

那时我还在一家电路板制造厂做“牛工”，一星期工作五天半，晚上还溜到东海岸海鲜馆当招待员，遇到官员来查，我们就伪装成食客；为了储学费报读工艺学院，我搏命似地工作，连一点娱乐也不敢有，额外的开销不敢花！（页 46）

家乡因此并不只是温情的来源，也是异乡人不得不持续忍受都市压迫的原因之一。城市/乡村这组对立并不是简单的“苦城乐乡”，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双向牵制。家乡迫使他们离开，异乡又无法容纳他们，如同慧敏下山时认出路旁枯槁及长了瘤的家乡常见老橡树，想起打扪湾一望无际的柚子园。在城市，家乡的经济作物柚子树成为高尚住宅区洋房花园的点缀，却长得奄奄一息、果实孱弱不成型，好像城里许多委屈的异乡人一般。

当人物真正返乡时，家乡也并未维持在记忆中的模样。丁云并没有把原乡浪漫化为永恒稳定的净土，而是持续书写原乡的衰败、变形与失落。《遥远的打扪湾》中，慧敏返乡后一路寻访童年的“梦之湖”，结果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

村后石场的炸石声隐去后，我朝熟悉的水溪涉水而上，拨开高过头的芦苇向湖泊寻觅去……。我隐隐觉得最后的炸石声将成为绝响，闻说山石已被采光了！打扪多少石场工人将失业，生活失去依凭？……越过水溪，穿过杂草丛生的小径，喔，我怔措住了。我要探访的湖泊呢？那个我童年捉红蜻蜓的美丽矿湖，那个乡人养生鱼，作为柚子欠收季可帮补家用的湖！那个我中学时代常相约同学去露营，垂钓，消磨整个年少的时光的“梦之湖”，竟然被填平了！被黄泥填平了，变成一片长满蔓草，野牛践踏的平原……听说发展商将在上面建房屋。（页 51-52）

宁静的山峦小镇被夷为平地，不落痕迹的变化让慧敏这个返乡人不胜唏嘘。“记忆中的家乡”与“现实中的家乡”断裂，“梦之湖”即将变成没有生命记忆的楼房，偏偏椰花酒寮、会馆楼上的非法赌档竟然还在，让乡人可以把一季柚子赚得钱都葬送在椰花酒、麻将和四色牌中。乡下的孩子考完初中或高中，到达申请护照的年龄就远走城市。原本承载童年记忆与地方情感的空间，转眼间被发展逻辑彻底改写。原乡不再是可回归的地方，而是同样陷入消失与异化之中。于是，人物面对的并不是“离乡/返乡”的简单往返，而是更深一层的双重失落：异乡无法安居，原乡也已不再。

不过，丁云并没有把家乡完全写成废墟，原乡仍短暂呈现出人与土地重新连结的可能。比如大沟湾水灾一段中，乡民冒雨修堤、同心协力抗洪，显示出一种在灾难中重新形成的共生关系。正因为如此，丁云笔下的原乡并非全然失效的空壳，而是一种一面不断失落、一面仍被召唤的情感空间。也正是这种若即若离、既失去又无法舍弃的状态，使家乡在小说中始终具有牵引力。

《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中的地志空间,并不是几个静态地点的简单排列,而是由内/外、中心/边缘、城市/乡村等多重对立关系交织而成的失衡结构:宿舍等内部空间率先崩塌,异乡人的普遍居住状态进一步揭示空间压缩;城市作为外部世界,又以种种显性与隐性的方式把他们排拒在中心之外;而当他们将情感退回家乡时,却又遭遇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最终,人物既失去了可以栖身的异乡空间,也失去了可以回归的原乡图景。正是在这种“双重失落”之中,丁云小说中的地志空间呈现出持续失衡的状态,而异乡人的漂流,也因此不只是身体的移动,更是空间归属感的不断丧失。

三、新柔长堤:流动、边界与无法完成的迁移

在《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中,“新柔长堤”不仅是现实中连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跨境通道,更是贯穿整部小说集的重要文学意象。它承载着异乡人对于机会、上升与新生活的想象,也同时标示着制度、身份与现实条件所构成的边界。丁云并未把长堤写成一个单纯的地理设施,而是不断通过人物的往返、等待、滞留与受挫,使它在叙事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长堤意味着流动,意味着从家乡走向异乡、从困顿走向希望的可能;另一方面,长堤又不断提醒人物,他们虽然能够通行,却未必能够抵达,所谓跨境,往往只是进入另一种更复杂的悬置状态。

长堤首先确实指向一种现实而具体的希望。马新两地距离极近,新币汇率相对较高,新加坡对许多大马华人而言长期具有“发展机会更多”的吸引力,因此,每天都有大量人物从马来西亚越过长堤进入新加坡工作、谋生、恋爱,甚至尝试以婚姻与家庭方式完成在异乡的扎根。对这些异乡人来说,长堤并非抽象象征,而是通向另一种生活的入口。大马女工在小说中的反复出现,正好揭示了这一层意义。她们来到新加坡,不只是为了赚取薪水,也常常把“留下来”视为一种人生转机,希望通过找到新加坡籍男友、建立婚姻或获得合法身份,使自己不再只是暂住的打工者,而成为能够真正落脚于异乡的人。

然而,丁云笔下的这种“希望”,几乎从一开始就带有脆弱与不稳定的性质。青瑶同时交往两个男朋友,把这种做法包装成“及时行乐”,但她最终怀孕、自杀未遂并被遣送回怡保;杨娓娓到新加坡不过两个月便交了男友,却因只有 SRP 初中文凭而无法注册结婚,关系被迫中断,后来沦为老板情妇,被发现后又只能转到其他工厂继续讨生活;卓燕结婚才一个月,丈夫便飞往美国进修,她自己身无积蓄,只能返回怡保养胎。也就是说,这些女性人物原本试图通过跨境流动完成身份转换,结果却一再被现实打断。她们从家乡跨越长堤进入新加坡,似乎朝向更好的生活迈进一步,最后却发现长堤并不保证“抵达”,而只是把人带入一个更不稳定的生活现场。

在这一点上，慧敏的形象具有某种例外性，也因此更突出了整体困境。她在高中考试 SPM 中考取五科优等，又有新闻专修班文凭，并不断存钱进修，最终成为小说中少数凭个人努力较为稳妥地留在新加坡的人物之一。可即便如此，慧敏的“成功”也不是轻松获得的，而是通过高强度劳动、自我压缩与长期牺牲换来的。这意味着，即使长堤确实为少数人开启了上升通道，它也并非一个平等、开放的入口，而更像是一个筛选机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越过流动本身，较为稳定地留在异乡，大多数人则在流动中反复受挫，最后梦碎他乡。长堤作为“希望”的意象，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失败的阴影。

大马女工的故事主要呈现了“通过跨境寻找未来”的愿望，小说中那位年近六十、二十年往返长堤的老人，则更集中地揭示了长堤作为“边界”的另一面：

有一次凌晨没车搭，我走过星柔长堤。刚巧遇到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也冒着寒风步过长堤。我们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新加坡公民，但太太却是柔佛新山人，结婚二十年了，孩子也快二十岁，但结婚注册始终不被批准！因为他太太只是个帮佣的劳工！

老人发着牢骚：“他们要的是精英！如果我太太是大学生，他们早就批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继续争取呢？”

老人叹口气：“我已经看化了……也习惯了，每天凌晨五点过长堤到裕廊工作，晚上又搭车回新山……长堤，我就这样不知不觉走了二十年，有什么办法？”（2004，页 53）

长堤从“通道”彻底转化成了“边界”。在地理意义上，老人当然能够每天穿过长堤；在生活意义上，他甚至已经把这种往返内化为日常惯性；但在制度与身份的意义之上，他始终没有真正跨越那道界线。二十年的婚姻、将近二十岁的孩子，并没有使夫妻关系获得应有的法律承认；“每天凌晨五点过长堤到裕廊工作，晚上又搭车回新山”的生活，不是通向稳定的流动，而是一种被迫持续的奔波。在这里，长堤不再是连接两地的便利设施，而是时时提醒人物自己仍被阻挡在完整生活之外的空间符号。正因如此，这位老人的困境并不只属于他个人，而是许多新马跨境夫妻共同处境的缩影：他们可以相爱、同居、共育子女，却未必能够获得制度承认；他们可以不断移动，却无法真正完成团聚。

这类跨境婚姻与居留困境，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人物之中，也与作者自身的跨境生活经验形成某种互文关系。丁云（2004）在《异乡梦寒》一文中曾提及想让孩子小涵认商晚筠作干妈，然而他与家人长期奔波于新马两地，为妻子与孩子

的居留问题反复申请与等待, 生活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直到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办妥家眷合法居留时, 孩子已经两岁半, 之前让孩子认商晚筠为干妈的念头也因各种烦琐事一再延宕。现实经验使得《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中关于跨境婚姻、居留与身份限制的书写, 并非单纯的社会题材再现, 而更像是一种切身经验的文学转化: 人物可以跨越地理边界, 却未必能够跨越制度边界, 只能在两地之间长期往返与等待。

丁云借文本情境, 描绘了长堤的双重性, 它表面上允许人物移动, 实际上却以更隐蔽的方式强化了身份、阶层与制度的界线。人物并不是被彻底禁止流动, 而是被允许流动、却无法通过流动完成生活的安顿。这种“可通行而不可抵达”的状态, 构成了丁云小说中特别重要的一层异乡经验。小说中人物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 而是被困在“不断移动却无法结束移动”的状态里。长堤之所以成为强有力的文学意象, 不仅因为它频繁出现, 更因为它把人物的生活形式本身塑造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漂流。走了二十年长堤的老人, 流动本身已经成为命运的形状; 大马女工在工厂、宿舍与恋爱关系之间辗转, 希望借由婚姻获得停驻, 结果却更深地陷入不确定之中; 新马夫妻为了维持家庭, 不得不长期往返于两地; 即便是较为成功的慧敏, 她的留下也并不意味着流动的终止, 而只是意味着用更剧烈的劳动换取暂时性的立足点。在丁云笔下, 流动并不是从“这里”走向“那里”的一次性跨越, 而是一种难以终止的生活状态。人物的困境, 不在于他们不能动, 而在于他们永远只能动下去。

这一点使得长堤意象向更深的历史维度延伸。新柔长堤作为现实中的基础设施, 自 1923 年开通以来, 本身就经历了不同政治与历史语境的重写。它曾经只是马来亚大陆与新加坡之间的运输通道, 后来又经历殖民政权、日据时代、紧急法令、大马独立、联邦重组与新加坡独立等历史时刻。尤其在 1965 年马新分离之后, 长堤由州属之间的连通通道转化为国与国之间的边界, 出入开始需要护照与通关程序, 其意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方便往返”, 而是把流动置于国界、制度与审查之下。也就是说, 长堤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空间, 而是一个被历史反复赋义的空间。丁云用这一意象统摄当代异乡人的经验, 正因为它天然携带着“连接/分隔”并存的张力。

在《梦回山巅》中, 林子安关于林明锡矿的讲述, 更把这种张力直接拉入华人南来谋生的历史脉络之中。家乡林明, 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地底锡矿场, 成也锡矿, 败也锡矿。100 年前, 第一批华人采矿者沿着林明河到林明开垦, 其中就有林子安的曾祖父。林子安的祖辈在林明建立家园, 扎根马来亚, 然而他们只是英资锡矿公司的廉价矿工, 100 年过去, 矿场主人一再更换, 但从曾祖父到林子安的父亲, 一代又一代命运的绳子永远把握在别人手里, 到了林子安这一代连矿工也当不成了, 被迫来到异乡星洲:

你没看报纸的吗？报纸都有报导，八十年代开始，锡价就从高峰逐步滑落，矿场一间接一间关闭。林明矿场，算是撑得最久的了。到了八七年，公司终于宣布矿场无限期停工……我们？我们如果不向外找寻出路，难道等着饿死吗？我和 Mimi，就是这样被迫来星洲的。（页 65）

丁云借解释林子安为何离开家乡、来到新加坡，揭示了更长的迁移逻辑。早期华人沿林明河而上，进入矿区开垦、劳作并建立家园，到了现代，矿业衰落、地方经济崩塌，后代又被迫再次离开家园，转而流入新的都市空间。人物的当下迁移，因而并不只是现代经济环境中的偶发事件，而是更长时段华人迁徙史的一个延续片段。林子安一家之所以“被迫来星洲”，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结构性命运的再次启动。

新柔长堤不再只是马新之间的现实通道，而具有了更大的隐喻性。它在当代承担的是马新之间的跨境流动功能，在深层潜文本里，却隐约对应着一百多年前华人南下南洋的海路与船只。今天的大马华人走过长堤到新加坡务工、恋爱、定居、失败离开，看似是现代国族框架中的跨境移动；但在更长的历史长河里，这种移动与早期华人为了逃离贫穷、战乱与饥荒而南来谋生，并无根本差异。只是过去承载迁移的是海船，如今承载迁移的是长堤；过去的“南洋”是想象中的机会之地，如今的新加坡同样被赋予类似的上升想象。于是，长堤意象在丁云小说中被悄然历史化：它既属于当下，也回响着过去；既是一道现实中的通道，也是一条历史漂流不断延续的轨迹。

丁云（2006）在《新马文学：一个漂流的身影！》一文谈到，东南亚华文作家的祖辈的“基因”里，只有逃难、饥荒、牢狱、战祸、困顿、颠沛流离的记忆。“漂流”几乎成为一种带有历史惯性的生存方式。作家们必须在漂流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脑子里装着的却是原乡最珍贵的记忆（丁云，2006），若从这一自我表述回看《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便会发现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跨境流动、异乡滞留与原乡回望，并不只是个别人物的遭遇，而更像是一种延续数代人的历史处境在当代的回响。人物一次次走上长堤，看似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移动，实际上却是在重复一种早已写入族群基因的漂流。

丁云以新柔长堤这一文学意象把“希望”与“限制”同时纳入同一个空间。人物之所以走上长堤，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异乡可能带来转机；人物之所以反复被长堤召回，则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完成真正的安顿。从大马女工的爱情尝试，到新马夫妻的婚姻困境，再到林子安一代延续一代的出走，丁云不断让人物在流动中体会到同一个事实，跨越边界并不等于消除边界，移动本身也不等于抵达。长堤由此成为一种典型的异乡经验结构，不断把人送向他处，却并不真正把人安放在他处。

上一节的地志空间揭示了异乡人在“居所”与“家乡”之间的双重失落,那么这一节中的新柔长堤,则进一步把这种失落推进到动态层面。恰如左伦(1984)提出的“时空体空间”,由叙事行为和运动所形成的共时、历时的空间结构,实际上是作者意志、情节阻碍、人物目的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它把人物置于不断往返、不断尝试、不断受挫的运动之中,漂流不再只是一个结果,而成为一种过程性的命运。丁云小说中的“流动”并非自由的移动,也不是通向归宿的过程,而是一种始终无法完成的迁移。

四、破碎的世界: 异乡经验的叙事与感知

如上讨论的地志空间与长堤意象,分别揭示了异乡人在居所与流动中的失衡状态,那么读者为何会在阅读时强烈感受到一种漂浮、不稳定、无所依靠的异乡氛围?这种感觉并不完全来自故事情节本身,更来自小说的叙事方式。丁云通过碎片化的空间片段、影像式的场景切换以及多重视角的交错,让异乡呈现为一个不断断裂、不断移动、难以固定的世界,读者经历被不断切割、不断重组的感知。

从空间呈现方式来看,《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中的异乡并不是通过一个完整的城市结构展现出来,而是通过一系列彼此分离的空间片段拼接而成:宿舍、工厂、雇主家、长堤、商业区、公园、码头、出租房、酒店房间、家乡道路、矿区旧址等。这些空间很少被完整描述,而往往只是以片段方式出现,人物从一个片段移动到另一个片段,空间之间缺乏连续过渡,仿佛城市不是一个可以整体把握的地方,而只是由许多临时停留点组成的网络。人物在这些空间之间不断移动,却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空间认知,因此读者所感受到的异乡,也呈现出一种拼接而成的碎片状态。

这种碎片感与丁云在叙事中有意安排的详略关系密切相关。小说中很少详细描述人物的工作空间,却反复描写他们的休息空间:宿舍、出租房、雇主家、酒店房间等。换言之,读者并不是通过完整的社会结构去理解异乡,而是通过人物最疲惫、最孤独、最私密的空间去感知异乡。《沉默的苏菲娅》中的女佣苏菲娅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空间,她既在主人家里工作,也只能在其中争取休息;《一无所有》中的阿扬甚至没有固定住所,他的休息空间是每天可以入住又必须退房的酒店房间。通过这些空间片段的反复出现,读者逐渐意识到,所谓异乡,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城市,而是一系列临时停留的地点。空间的临时性,使人物的生活呈现出悬置状态,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异乡地图”,只能跟随人物在不同空间碎片之间移动。

除了空间的碎片化,《迷途的黑鲸》小说集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影像化的叙事方式。小说中的许多场景并不是通过连续叙述展开,而更像是一组被剪接在一起的画面,在阅读时,往往不是沿着情节推进理解空间,而是像观看镜头一样,通过一幅幅场景迅速把握异乡的氛围与状态。例如《一无所有》中关于香港徙置区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的影像式段落:

香港徙置区。两张年轻,惊悚的脸挤在窗前向外探望。凄雨的巷子,仍然有“道友”出没,悄悄买到毒品,便肆无忌惮蹲在楼梯角“追龙”,吞烟吐雾!紧随着哭号声起,有位十三四岁,还发育未全的少女被父亲粗暴地揪住头发,追打出门外,少女摔倒在污水中!母亲慌急地捶打、拉扯,保护着女儿……跟着,泥泞路又闯进两个穿着雨褸的警员,追捕着一位抢匪,仓促的脚步从长满青苔的石级上踩过,惊起蜷缩在墙角的两只老鼠!等一切都恢复了平寂,“道友”仍蜷缩那儿抽他最后一口白粉,老鼠仍然淋淋抖抖在墙洞里,看尽生活的暗症风景!(2004,页110-111)

在这一段中,叙事并没有围绕某一个人物或事件展开,而是像镜头一样不断切换。窗前的人脸、雨巷中的吸毒者、被迫打的少女、追捕抢匪的警员、墙角的老鼠,这些画面彼此之间并没有完整的因果关系,却通过连续出现构成一个压迫而混乱的空间印象。读者并不是通过故事理解这个地方,而是通过视觉画面的快速叠加“看见”这个地方,从而直接感受到其中的危险、贫困与绝望。这种以画面而非情节组织空间的方式,使异乡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却也显得更加破碎与不稳定。

这种影像式的叙事方式,与丁云的创作经历密切相关。丁云(2018)曾谈及自己的长篇创作时指出,由于长期从事电视剧、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电影美学常常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因此小说中经常会运用影像美学的现场感、蒙太奇、交替剪接、镜头转换、人物立体感、音乐介入、环境蒙太奇等手法。若从这一点回看小说中大量快速切换的场景与画面式描写,正可以理解为一种“镜头式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人物仿佛被置于不断变换的画面之间,而异乡也因此不再是一个可以稳定停留的空间,而是一组不断闪现又消失的影像。

除了影像式场景切换,小说还大量运用时间与空间交叉错位的方式,使人物同时处在多个空间之中。《一无所有》中的阿扬,生活空间不断变化,现在的异乡新加坡、过去停留的香港,以及更早离开的北京,这些空间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出现,而是通过记忆与意识不断交错出现。人物在窗口看到香港的街道时,也仿佛看到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空间与时间因此不再是线性关系,而是彼此叠加、彼此渗透。人物并不是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而是始终生活在多个空间的重叠之中。甄供(2005)在评价《迷途的黑鲸》小说集时也注意到这一点,指出丁云在小说中借鉴了某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例如以意识流动来表现人物

内心世界的图像, 或通过时间与空间的交叉错位, 按照心理时间展开人物的矛盾与冲突等。这种叙事方式使人物仿佛同时生活在多个空间之中, 也进一步强化了异乡经验中那种无所依附的漂浮感。

除了影像式片段与时间错位,《迷途的黑鲸》小说集还通过多视角结构,使整个异乡世界呈现出一种没有中心的状态。小说集由多个单篇构成,不同篇章由不同人物视角展开,有第一人称,也有第三人称;有的视角是限制性的,有的则接近全知视角。同一人物有时会在不同篇章中出现,例如慧敏在不同故事中反复出现,使不同故事之间形成隐约的联系。然而,这些人物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心人物或中心叙事,读者必须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正体现了左伦(1984)的文本空间的此在-彼在(Here-there)视角观点,叙述行为的空间位置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间的联系,在“世界”中某一时刻被感知为前景的事物与被感知为背景的事物之间的互联互动,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异乡世界。

在这种多视角结构中,每个人物都只能看到世界的一部分:泰工看到的是工地与宿舍,女佣看到的是雇主家庭内部,女工看到的是工厂与出租房,跨境夫妻看到的是长堤两端,阿扬看到的是不断更换的城市与房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够看到完整的世界,读者也只能通过这些彼此重叠却不完全重合的视角,逐渐拼凑出一个由不同空间片段构成的异乡图景。正因为世界是通过多个不完整视角呈现出来的,它在读者感受中也就呈现为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稳定结构的世界。

丁云不仅写人物视角此在的所见所想,他作为异乡人一份子也参与进异乡世界的建构。在《异乡梦寒》一文中,丁云以“我”的口吻悼念好友商晚筠,“作者的痕迹”在“异乡梦”系列的创作中不时存在,慧敏人物也加入了不少丁云自身的色彩,借慧敏之口诉说人在异乡的心况。人物在异乡的此在同时存在彼在的家乡,也有卓燕此在的家乡和彼在的异乡。《迷途的黑鲸》小说集中的异乡并不是一个可以用地图标示出来的具体地点,而是一种通过碎片化空间、影像式场景与多重视角共同构成的感知结构。人物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无法获得稳定的空间认知;读者在这样的叙事中阅读,也无法获得稳定的空间想象。异乡之所以显得无所依,并不仅因为人物远离家乡、生活艰难,更因为他们所感知到的世界本身就是破碎的、跳跃的、没有中心的。丁云通过这种叙事方式,使“漂流”不只是人物的生活状态,也成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亲身感受到的一种存在状态。

五、结语

通过对《迷途的黑鲸》小说集的考察可以发现,丁云的“异乡梦”书写并未停留于传统的离散叙事模式,而是通过多层次的空间建构,呈现出一种持续失衡

的生存经验。在具体的空间场景中，居所的压缩与外部环境的排斥，使异乡人难以获得基本的安身之地；在跨境流动的过程中，长堤既象征通达的可能，也不断强化现实中的边界与限制，使人物被困于无法完成的迁移之中；而在叙事层面，碎片化的结构与多重视角，则进一步瓦解了稳定的空间感知，使“此处”与“彼处”之间始终处于游移状态。

正是在这三重层面的交织之下，小说中的“异乡”不再是可抵达并安顿主体的空间，而成为一种不断生成的漂流过程。人物既无法真正融入现实中的异乡，也难以返回记忆中的原乡，从而形成一种“无处为家”的存在处境。因此，丁云小说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的离散经验，而是一种既无法安居、也无法抵达的存在状态。

这种处境不仅指向个体层面的情感经验，也隐约回应了更长时段以来华人迁移历史中的反复流动与不稳定性。由此观之，丁云通过具体而可感的空间书写，将抽象的离散经验转化为可见的生存状态，并在流动与边界之间呈现出现代跨境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张力。《迷途的黑鲸》不仅丰富了马华文学关于“漂流”的叙事形态，也在空间经验的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解当代跨境主体处境的文学方式。

参考文献

丁云（2004）。迷途的黑鲸：丁云短篇小说选。玲子传媒。

丁云（2006年9月）。新马文学：一个漂流的身影！。《燭火》，20，76-79。

丁云（2018年3月）。绝望——文学的诞生！。《燭火》，54，32-33。

张锦忠（2003）。《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麦田出版。

甄供（2005年9月）。丁云小说给以的启示。《燭火》，17，49-50。

Bachelard, G. (2017). *The poetics of space*. (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原著出版年：1957）

Devine-Wright, P., & Manzo, L. (2013). *Place attachment: Advances in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Routledge.

Zoran, G. (1984).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5(2), 309-335.

<https://doi.org/10.2307/1771935>